

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

苏若群 姚金果 著

国民党内有过怎样的联共与拒共的较量？

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走向合作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抉择？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达林、越飞、鲍罗廷……在国共合作历史风云中是如何纵横捭阖的？

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上演了怎样的攻与防、谋与略？

各种宣言和事件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玄机？

南征与北伐之中有着怎样的利益斗争？

蒋介石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权力制高点的？

为什么说国共关系的破裂决定了国民党最终惨败

的命运？

 中共党史出版社

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

苏若群 姚金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苏若群,姚金果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098-3011-6

I. ①第… II. ①苏… ②姚… III. ①国共合作—史料—1924~1927

IV. ①K26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9888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兵

复 审:黄 艳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426 千字

印 张:27.5

印 数:1—3070 册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3011-6

定 价:50.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目 录

一、黑暗中诞生的国共两党

孙中山奋斗在逆境中 /1

来自莫斯科的关注 /7

“南陈北李”的约定 /11

红船启航 /17

二、国共合作的酝酿

马林对国共合作的设想 /23

列宁关心国共合作 /28

达林联系两党领袖 /30

中共选择党外合作 /32

三、“党内合作”的争论

国共应对陈炯明叛乱 /36

马林取得“尚方宝剑” /46

中共领导人的抗争与服从 /49

共产国际正式决议 /52

四、国共两党艰难抉择

越飞的三重外交 /56

苏俄锁定孙中山 /63

初尝失败之痛 /69

伸出合作之手 /72

目 录

五、铺平合作之路

领袖间的攻与防 /77

鲍罗廷改变孙中山 /83

“联共”之难 /88

合作正式形成 /91

六、抵制排共浪潮

陈独秀希望真诚合作 /98

检举共产党风潮 /101

国共代表间的舌战 /109

孙中山坚持合作 /114

陈独秀控告鲍罗廷 /121

七、创建黄埔军校

创建军校的动力 /126

“这是革命的黄埔” /128

艰难起步 /131

活跃的共产党人 /140

八、携手固根基

镇压反动商团 /142

东征陈炯明 /149

平定杨、刘叛乱 /155

目 录

南征邓本殷 /158

九、掀起大革命高潮

孙中山北上 /161

国民会议运动 /174

五卅运动 /176

省港大罢工 /186

十、国民党二大

戴季陶主义 /189

孙文主义学会 /193

西山会议派 /197

国民党二大 /201

十一、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是怎样一个人? /213

中山舰事件 /223

布勃诺夫的退让 /228

质疑“反击”说 /234

十二、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的“整军肃党” /239

鲍罗廷的妥协 /241

陈独秀言不由衷 /252

目 录

十三、合力北伐

决策北伐的是是非非 /256

攻取湖南 /266

攻克武昌 /273

进军江西 /276

横扫东南 /281

冯玉祥的配合 /285

十四、翻天覆地的革命

工人运动 /289

农民运动 /293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300

上海工人三次起义 /304

十五、四一二反共政变

中共中央12月会议 /312

迎汪复职 /317

迁都之争 /322

南昌与武汉的“攻防战” /333

血腥四一二 /339

十六、武汉在风雨中飘摇

二次北伐 /354

目 录

战略退却 /360

夏斗寅叛乱 /363

马日事变 /367

十七、危机在加深

负效应在发酵 /370

限制工农运动 /374

“礼送”共产党人 /376

十八、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无法执行的“紧急指示” /379

郑州会议 /390

徐州会议 /395

寻找良策 /399

汪精卫分共 /411

结 语

“赢”与“输”的变换：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启示 /419

参考文献 /428

后 记 /433

一、黑暗中诞生的国共两党

孙中山奋斗在逆境中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他幼年时对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十分仰慕，这种仰慕与他后来决心推翻清王朝也许没有必然联系，但他后来确实是以洪秀全的继承者自称。

很难说孙中山从小就已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宏愿，但小时候的亲身经历，还是让他看到了中国的愚昧落后。

一天，孙中山正与同学们在私塾里念书，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嘈杂声。跑出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强盗正在破门抢劫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侨商。村民们由于害怕强盗报复，谁也不敢上前阻拦。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强盗堂而皇之地从这位侨商家里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遭到这场厄运的侨商，眼看强盗们带着抢到手的东西扬长而去，绝望地哭喊着：“我完了，许多年来我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辛苦积攒的财物，被强盗一下子全抢去了！如果我留在洋人的地方，那里有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何至如此！回到自己的家园，反而没有保护了！”

这位华侨绝望的声音，在孙中山幼小的心灵中搅起层层波澜，他好奇地想：那“洋人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中国的政府不保护中国的老百姓？怀着这种好奇，他总想有机会到那“洋人的地方”去看一看。

1878年，孙中山随着母亲去投靠在檀香山的哥哥孙眉，他终于看到了“洋人的地方”。

在檀香山，孙中山开始接受另一种文明的熏陶。

与在中国的私塾里读书截然不同，这里的老师上课时不带那吓人的铁戒尺，

讲课时也不用那令人昏昏欲睡的声调，教学的内容丰富多彩，全然不是私塾里的四书五经，而教学方法又很新奇，不是孙中山已经习惯了的死记硬背……这一切的一切，都令孙中山觉得大开眼界。

这一时期，孙中山还受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的影响。

被华人华侨称为“檀香山”的这个美丽的岛屿，美国人叫它“夏威夷”。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就认定夏威夷是美国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跳板，产生了吞并的野心。1895年，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其势力就侵入夏威夷。长期以来，檀香山人民为了保持独立性，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当地华侨也卷了进去。孙中山目睹了檀香山人民的反美斗争，十分钦佩这个弱小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勇气。

大开了眼界的孙中山，将中国政治腐败、国体衰微的状况同西方国家的发达、富强作了比较，发现中国的病根在封建专制制度，从而逐渐萌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愿望。他后来追忆说：“至檀香山，就傅西学，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互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胞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着必使我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①

从1895年创建兴中会，到1905年成立同盟会，再到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孙中山一直在苦苦地寻求着“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道路。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短时间内，颁布了许多革新的法案，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艰难而殷切地开拓着新生共和国的征程。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然而，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提不出一个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没有广泛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于192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将中华民国的大权交给了袁世凯。

中国人民刚刚见到一线“民主共和”的曙光，便再次跌入黑暗的深谷。

^① 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讲》，上海《民立报》1912年5月14日。

孙中山后来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的信中承认，将政权交给袁世凯是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他无不沉痛地说：

我的政治事业，在1911年10月开始并迅速普及全国的革命中获得了自己决定性的表现。革命的结果，是推翻了满清并建立了中华民国。我当时被选为总统。在我就职后不久，我便辞职让位于袁世凯，因为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比我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会发生的一样。袁世凯很快就开始了恢复帝制的勾当。^①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再次激起了孙中山的斗志，为了维护“共和”这面旗帜，他又开始了新的斗争。

1912年8月，孙中山将同盟会与国民公党等四党合并，创立了国民党。孙中山对国民党寄予很大希望。8月25日，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他在演讲时说：“革命成功在四万万同胞一心，巩固民国亦必要一心，今五党合并为一大政党，乃民国大幸福。然视他党，要亲如兄弟，盖政党以国家为前提，非谋一党权利。欲巩固民国，须巩固心理，要知今日之民国乃人人心理所造成。各党宗旨虽殊，俱是为国家互相翼辅进退，万勿争党见陷国家于危险地位。”^②

然而，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对要求入党的人员缺乏必要的考察，致使其成分极为庞杂，不少投机分子和封建官僚，甚至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混入其中，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此时的孙中山，却醉心于“实业救国”，无暇顾及国民党组织的整顿。

1913年3月20日晚，一直为政党政治奔走的国民党员宋教仁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杀害。血淋淋的事实唤醒了沉溺于实业建设中的孙中山，他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保障的国家，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以和平手段

① 《孙中山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②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发表了《国民党政见宣言》。

取得政权的理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从此，他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梦想，决心率领革命志士，发动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发表《讨袁檄文》，率军向驻沙河的北洋军李纯所部第六师发起进攻，拉开了“二次革命”的战幕。孙中山立即命令上海、南京等地急起响应。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宣布江苏独立，发表《讨袁通电》，谴责袁世凯灭绝人道，破坏共和。随后，上海、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倒袁。

仓促起事的讨袁军，由于没有坚强的政党领导，又缺乏战略计划和统一指挥，结果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队各个击破，“二次革命”不幸夭折。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国民党从辛亥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丧失殆尽，在国民党人心中造成了重大创伤，许多人对革命的前途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因“二次革命”失败而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每每谈起将来的事业，都灰心丧气，毫无信心。一位流亡日本的革命者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我也深感前途渺茫，一时找不到一条救中国的道路。这种苦闷，正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无法逃避的悲哀！”

革命事业需要中流砥柱，革命党人需要坚强而英明的领导。孙中山再一次站了出来！他从失败和悲伤中挺起了胸膛，劝告革命党人振作起来，恢复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战斗精神，为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保卫民主共和而继续战斗。他在给革命党人的信中表示：“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万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①

“二次革命”失败后，大批国民党员消极甚至叛变，给了孙中山以很大打击。他决心淘汰伪革命党人，建立一个能贯彻主义、纪律严格、有战斗力的革命党。

^① 邓泽如编：《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卷二，广州述志公司1927年影印版。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这表明，孙中山希望中华革命党继承同盟会的精神，把推翻袁世凯的封建专制统治、恢复民主共和制度、重新缔造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

孙中山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他仅以反袁作为革命的目标，没有把袁世凯反动和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因而，也提不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加之他将党员按首义、协助、普通分为三个等级，要求入党者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也就是服从他自己，从而将更多的人阻止在中华革命党之外，使这个党始终只能是一个人数寥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小团体，党员最多时也只有五六百人。

1916年6月6日，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与他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一起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继袁而起的黎元洪，打出召开国会、重造民国的幌子。孙中山相信了黎元洪的话，认为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革命党的使命已经结束，于是下令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党内发出通告，宣布：“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将来如何改组，有何办法，应征求海内外各支、分部之意见。”

就这样，孙中山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解散中华革命党，但这个党已经名存实亡。不仅如此，孙中山还下令革命党交出枪支，放弃了争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机会。他自己则准备再次从事实业方面的工作。

然而，黎元洪一上任就埋头于同内阁总理段祺瑞的争斗，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不久，黎元洪在斗争中败北，段祺瑞成为政府中的实权人物。段祺瑞上台伊始，即公开宣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这样，孙中山恢复约法的希望最终变成了一缕青烟，在段祺瑞的反动统治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孙中山愤怒了！他坚决指出：约法和国会，是共和国之命脉，如果听任约法废弃，国会解散，则数十年的革命成绩，全被推翻，而将来国家根本之宪法，亦无从制定。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他高举“护法”旗帜，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这时，孙中山既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也没有坚强的革命组织，更不懂得去唤起民众。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西南各省的军阀。这些军阀之所以追随孙中山，目的是在扩大自己的势力，“护法”只是一个幌子。所以，“护法”斗争是建立在一个很不可靠的基础上的。

1917年7月，孙中山在海军支持下南下“护法”。8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为元帅。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10月，护法战争在湖南拉开战幕。

然而，陆荣廷和唐继尧却主张与段祺瑞议和，一心要把反对议和的孙中山挤走。在他们的操纵下，1918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5月4日，国会选举唐继尧、唐绍仪、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懌、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总裁，并以政学系头子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实际上剥夺了孙中山的权力。

孙中山愤恨军阀的跋扈，但又无力反击，只得向国会非常会议提出辞去大元帅职。

5月21日，孙中山怀着“国将不国”的沉重心情，黯然离开广州，到达上海。至此，他终于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

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在这座加拿大华侨赠予的房子里，孙中山病倒了。他躺在床上，感到孑然无助，一筹莫展。不久，吴玉章前来拜访。他是受广州军政府之托，专程到上海劝说孙中山去广州就任总裁一职的。吴玉章回忆他与孙中山见面的情景时说：

中山先生忧伤后生病睡在床上。我就坐在他的床边同他谈话，我说明了来意，又简单地谈到了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七总裁的经过，最后请他就职，以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中山先生当时气愤得很，坚决不干。他说那些人还革命？！他们根本不革命！他们想拿军政府同北方议和以保个人权位，我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我就劝他，我说时局这样混乱，南方各省当局虽然还不很好，但他们还打着护法的旗帜反对北洋军阀，这点是好的。现在南方、北方都很混乱，南方各省有势力的当局虽然同床异梦，各有野心，但他们还想利用革命招牌以壮声势。我们必须保持一些革命势力以图发展，革命道路是曲折的，我们不能脱离革命战线。南方的势力派虽然排斥先生，但又不敢完全丢掉先生，他们还

想利用先生的威望，所以还给先生安一个位置。先生如果不同他们合作，而离开了他们想自己搞革命，这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会受到两面夹攻，一方面是南方军政府打击先生，另一方面北方军阀更要打击先生。南方各派所以还要给先生一个总裁是怕舆论攻击。先生不去，他们就有话可说了。拥护先生的革命力量还是有的，如广东有陈炯明的队伍，陕西有于右任的队伍，湖南有程潜的队伍，湖北还有一些革命力量，尤其是老同盟会员熊克武已经统一了四川，有很大的力量。这些力量都希望先生来维系他们，团结他们。南方势力派想出卖军政府与北方议和，如果先生在其中团结真正的革命力量，也能制止他们的出卖，以保存革命势力。先生不要看岑春煊现在煊赫一时，如果他不好自为之，将来他的失败比先生更凄凉得多，希望先生委屈求全保持革命的联合战线，先生如果不愿亲自前去，派一个代表去也可以。我说这番话后，他不胜感慨地流下了眼泪，随着说：我听你的话决定派汪精卫去。^①

孙中山何尝不想去广州再创一番事业？但是他明白，当自己一无军队二无金钱的时候，一切努力都只能是徒劳。

来自莫斯科的关注

奋斗在逆境中的孙中山，曾经得到列宁的关注和赞扬。那还是在1912年，当列宁从多种渠道得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着手进行社会改造之后，于当年7月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列宁在文中指出：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和鲜血——不是国王和皇帝的鲜血，而是为

^① 吴玉章：《对孙中山先生的一段回忆》，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267页。

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們的鮮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完全变得寡廉鮮耻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出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弱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①

这一时期，俄共（布）领导人在秘密和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高度评价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肯定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同时也指出其缺点和不足。

1917年，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人民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资本主义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此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代。

孙中山当时虽然还没有真正明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但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仍然为之感到兴奋和鼓舞。

1918年夏，当全世界的反动势力一致疯狂地诅咒和诬蔑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时候，孙中山以“中国南方议会”的名义，给列宁和苏俄政府写了一封贺信，热烈祝贺俄国革命成功，并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苏俄人民的友好情谊和希望与俄国革命党交往的愿望。他在信中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②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② 信的全文尚未找到。上述内容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0页；韦慕廷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122页。

这是笔者目前发现的孙中山最早表达对俄国革命向往的信件。这也可能就是孙中山后来确定“以俄为师”的最初动因吧。

如果考虑到当时的通讯条件，孙中山这封贺信能够到达苏俄领导人手中肯定会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据说，这封贺信是经过很曲折的过程最终才托美洲的华侨以电报形式发到俄国的。

很难想象苏俄领导人收到孙中山的信后是什么反应，不过，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当年8月1日给孙中山的复函中，可以判断他们的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

契切林在复信中称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是“从1911年起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带领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奴役者——中国北方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政府——的伟人”，是中国劳动阶级“尊敬的导师”。^①

这肯定是一封对孙中山可能产生巨大鼓舞的信件。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通讯条件所限，这封信最终未能到达孙中山之手。此信在几十年后才被苏联方面公布出来。^②

1919年底和1920年初，旅居上海的俄国劳动社负责人马特耶夫·鲍德雷先后两次拜访了孙中山。与此同时，一个名为波波夫的俄国陆军上校和另一个叫波达波夫的俄国将军，都与孙中山进行过接触。很显然，孙中山给波达波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波达波夫在给契切林的信中，这样介绍孙中山：

我在上海时同孙逸仙博士联系密切，他是一位狂热的反英者，与北京政府和（目前垮台的）广州政府势不两立。

在中国各地他都有追随者，在革命人士中他有一些忠实的朋友。

……

孙逸仙博士有资金，许多资本家常常向他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孙逸仙在海南、四川、福建等省有很大影响，在他的影响下，在这些省份和在中国其他

①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

② 1957年，苏联的《国际生活》第11期以《与孙中山交换的外交信件》为题，刊载此信；1958年，中国的《史学译丛》第3期发表了由孙剑晨翻译的同题中译文。但笔者不能肯定这就是最早公开此信的时间。